

动国家重建，也门胡塞民兵与哈迪政府大致分清“楚河汉界”……

然而，动乱的因子并未因生灵涂炭而远去，甚至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幸免内战的国家——约旦、黎巴嫩和埃及出现“第二轮发作”。由于无力彻底改革的政府解决不了飙升的年轻人失业率和其他深层次问题，数以百万的年轻人失去经济和政治参与资格，渐渐变成难以捉摸的“乌合之众”。约旦分析人士阿米尔·萨拜利赫说：“我认为2020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他的国家尽管为避免新冠病毒传播颁布过禁止聚集活动的规定，可失业者与低收入人群仍坚持2018年以来的反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每周集会，这场集会已在2018年赶走一位总理，现任总理也似乎来日无多。

客观而言，中东各国（除以色列外）经济大体分为“石油经济”和依附于此的“打工经济”或“服务经济”。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令石油成为世界经济“血液”，而中东油气储量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超大型油田60%以上都在中东。而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的“油价革命”，让阿拉伯产油国享受了整整20年的“黄金时光”，据统计，仅1973-1980年，沙特、科威特、阿联酋、伊拉克的外汇储备都有30-50倍的增幅，哪怕是21世纪头十年，这些国家（即便遭受战争摧残的伊拉克）都能维持相当的景气，特别是2011年依靠国际油价达到每桶107美元，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逐渐取代非产油国埃及，成为中东新的财富中心及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也是为什么产油国是“阿拉伯之春”中受冲击较小，

正因为石油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注定了中东经济整体上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大把撒钱缓和阶级矛盾是重要原因。

石油经济的繁盛，更给那些非产油国造成“扭曲”，在集中于波斯湾的产油国“财富效应”诱惑下，依托语言文化相通的优势，埃及、约旦、也门、黎巴嫩等非产油国被其表面繁华所吸引，掀起“去海湾国家打工赚钱”的热潮，黎巴嫩更因绝佳的“自由港”地位成为中东货物中转与金融服务的集散地，大批资本涌入贝鲁特股市债市，成为该国的“摇钱树”。

然而，照经济学家熊彼得的话形容，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模式必然产生“食租寄生”效果，尤其是中东经济“去工业化”。事实上，多数阿拉伯国家依托高油价带来滚滚美元，使昔日贫困落后面貌一夜消失，奇迹般地跨入资金过剩、生活充裕的“后工业时代”，从阿联酋、卡塔尔到科威特、沙特，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占到各国外汇收入的80%，不仅使其深受油价涨落影响，政府财政难以预期，更重要的是，过分依赖石油收入，抑制了其他产业发展。有人戏称，沙特等国能出口创汇的，“除了石油，就剩下椰枣、骆驼和马了，这些国家几乎造不出世界市场所需的任何东西”。即使在能源工业领域，由于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石油产能不足，一些国家甚至要从国外进口精炼汽油，出现“产油国进口油”的怪现象。

至于那些寄生于产油国的阿拉

伯国家，随着2011年之后国际油价进入下行区间和政治风波冲击，更如雨中浮萍，任由拍打。最典型的莫过于埃及与黎巴嫩。其中黎巴嫩70%的人口从事服务业，还有大批劳工进入海湾国家谋生，一旦外部风云起来，就会造成国内就业压力骤增。

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石油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注定了中东经济整体上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产油国将大量外汇投资于美国等西方大国，使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和汇率调整，不断榨取石油输出国的财富，2011年中东剧变中，海湾国家之所以与美国结成“同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海湾国家无论石油出口还是剩余资本投资，都明显依赖美国市场。这种看似你情我愿的“利益绑定”关系，实际是海湾国家财富不断流向西方国家的过程。“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中东的石油与16世纪南美洲的银子非常相像，后者流向欧洲，去创造富有活力的欧洲经济。”即便流向黎巴嫩之类的阿拉伯国家，也大多以地产、旅游、期货等“快进快出”的领域居多。

因管理不善被毁

凯恩发现，2020年的中东抗议活动竟集中在躲过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像黎巴嫩、伊拉克、